

『冶城历史与福州城市考古』

论文选



YECHENGLISHIYUFUZHOUCHENGSHIKAOGU

LUNWENXUAN

『冶城历史与福州城市考古』论文选

海风出版社



32845
03
86059

海

冶城历史与福州城市考古论文选

本书系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 95 规划 97 年度项目
“福州城市考古研究”课题阶段成果。

主 编:王培伦 黄展岳
执行编辑:林 果 吴春明
责任编辑:杨智臣
装帧设计:周钦尧
封面摄影:朱 滨

冶城历史与福州城市考古论文选

主编：王培伦 黄展岳

海风出版社出版

(地址：福州市鼓东路187号 邮编：350001)

福州市教育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80mm 1/16 印张：17.5 字数：35万

1999年3月第一版 1999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7 - 80597 - 199 - 4/G·4

定价：68元

前 言

“冶城学术研讨会”的论文要结集出版，这对我们文物系统来说是件大喜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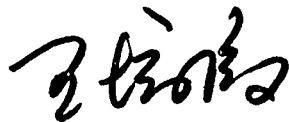
从汉高祖五年（前 202 年）无诸被封为闽越王算起，到今年福州正好经历两千两百年的历史。早在去年，中共福州市委、市政府就提出要借助福州建城 2200 年的机遇，加速发展福州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并确定了“建城纪念搭台、经贸交流唱戏”的目标，开展“纪念福州建城 2200 年暨’98 福州国际招商月”活动，冶城学术研讨会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闽越国都城——“冶”的地望，自《史记》以来的两千多年间，历代学者都认为在今天的福州。到了本世纪三十年代，首次出现了“浙南说”，随之劳干先生对冶在“福州”的观点作了十分系统的考证。建国后，随着现代考古学在我省的开展，崇安汉城等一批汉代遗址相继在闽北的发现和考古发掘，于是又出现了“闽北说”。最近几年，福州屏山地区陆续出土了汉代遗物（如“万岁”瓦当等），“福州说”的论点在大量文献资料支持的基础上又得到了考古材料的佐证。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学术讨论，在新的考古材料日益增多的情况下，渐渐趋向同一。

我们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于去年就广泛地向全国各学术团体和科研单位及海外学者发出邀请，征集论文。受到了各地有关专家学者们的广泛响应。今年 5 月 21—23 日，“冶城学术研讨会”如期在福州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来自北京、浙江、广东、福建及台湾的专家学者 81 人，大会收到各类学术论文 69 篇。中共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赵学敏，中共福州市委副书记、福州市市长翁福琳等领导到会表示祝贺。经过与会同志的共同努力，研讨会取得了很大成果，大家在“冶”城问题上观点进一步趋向一致。通过讨论，绝大多数学者包括一些原来持“闽北说”的学者都接受了“二王二都”的论点：即闽越国时期同时并立的二个国王，其正统的国都“冶”在福州，它是当时闽越族的政治、经济中心；同时，崇安汉城也是闽越国时期的一座规格很高的城址，极有可能是东越王余善的王城。当然，应该承认由于新出土的考古材料尚未有完全的说服力，同时仍有少数学者依旧持“闽北说”；在“福州说”的观点，也存在对具体地望是在屏山一带，还是在新店古城的分歧。这些分歧的存在，也就对我们今后的考古工作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应当加强在福州地区，特别是冶山一带的考古发掘工作，力求找到汉代“冶城”的宫殿或其它有说服力的遗迹，以求圆满结束对“冶城”地望的争论。我们相信，只要领导上重视，同志们努力，这一天的到来是不会太遥远的。

本书所收论文，基本反映了这次学术讨论会的成果。每篇文章都有一定的学术质量。但由于时间仓促和水平所限，选编工作还存在一定缺点，欢迎大家批评指正。同时，因为篇幅所限，少量文章未能收入本书，还祈望作者们见谅。

在本书的编选过程中，得到海风出版社的大力帮助，编辑同志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建议，使本书得以与广大读者见面，在此谨表谢意。



1998 年 8 月

目 录

闽越东冶汉冶县的治所问题	黄展岳 (4)
关于闽越历史的若干问题	卢兆荫 (9)
城村古城不是闽越国城	林汀水 (13)
再谈冶都、冶县、东部侯国	
与东部侯官的沿革、治年问题	林汀水 (17)
关于“冶”在福州的历史论证	黄启权 (21)
冶城的福州的考古新证据	范雪春 (24)
汉城越国都城考	王振镛 (36)
闽越国冶城考略	黄荣春 (39)
闽中第一城	卢美松 (48)
闽越王无诸的冶城在福州新店	欧潭生 (52)
新店古城是闽越冶城的卫城	王华南 姚亚丹 (54)
“冶”城在何处	杨秉纶 (59)
浅议闽越国的兴亡及闽越国都城	陈锦谷 (63)
“冶”城的几个问题	姚亚丹 (68)
西汉朝廷与闽越国的关系和余善的反叛	林 果 高健斌 (71)
论闽越国建国与都城	林祥瑞 刘祖陞 (74)
冶、东冶、侯官与闽越二王二都	徐心希 (77)
“冶”在福州	朱云斌 (82)
“冶”与福州	曾意丹 (88)
也从郡县沿革看冶城地望	郭志超 吴春明 (91)
冶城不在泉山下	钟礼强 吴春明 (96)
从闽越史探讨闽越的都城	蒋炳钊 (101)
关于闽越国都的地望问题	杨 琮 (106)
东越泉山与闽越之冶	林慰文 (111)
冶都地望研究的回顾和管见	辛土成 (117)
福州屏山农业厅用地试掘简报	周春水 高健斌 (121)
福州屏山、冶山一带的冶城遗迹	张 勇 (128)
闽越国史迹考	官桂铨 官大梁 (130)
闽侯闽越王祠庙	张发平 (142)
闽清永泰的闽越王史迹	林跃先 (144)

越王山闽越史迹	杨晓蕾 (146)
关于昙石山文化界定的重新思考	吴绵吉 (148)
福州地区的原始居民	陈 龙 (153)
闽江下游原始居民点的形成及福州 早期城市的产生	郑国珍 (163)
福州地区的早期历史及城市发展	林忠干 (167)
试论福州城市的起源	陈子华 (174)
秦汉闽中地名考析二则	林汀水 (177)
福建政区建置的过程及其特点	林汀水 (180)
福州市区水陆变迁初探	林汀水 (186)
福州自然地理变迁	游天星 (192)
福州历代城池	曾 江 严 珍 (194)
福州建城史之思考	林伟功 (200)
浅谈福州城池的六度变迁	番 群 (203)
王审知与福州城垣建设	肖忠生 (205)
福建晚唐五代考古与王审知治闽	梅华全 林存琪 (207)
一个传教士眼中的福州	叶 翔 (213)
粤闽地区汉代建筑遗址的比较研究	邱立诚 (217)
浙南先秦文化述略	王海明 (224)
古代福州与琉球	陈仲玉 (232)
福州与冲绳的关系	徐恭生 (238)
在冶城与福州历史学术研讨会上的主题报告	黄展岳 (249)
附录	
秦郡考	王国维 (254)
汉会稽东部都尉治考	王国维 (256)
后汉会稽东部候官考	王国维 (257)
汉晋闽中建置考	劳 干 (258)
古闽地考	叶国庆 (265)
冶山财政厅用地的考古新发现	朱云斌 周春水 (271)

前 言

“冶城学术研讨会”的论文要结集出版，这对我们文物系统来说是件大喜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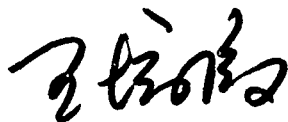
从汉高祖五年（前 202 年）无诸被封为闽越王算起，到今年福州正好经历两千两百年的历史。早在去年，中共福州市委、市政府就提出要借助福州建城 2200 年的机遇，加速发展福州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并确定了“建城纪念搭台、经贸交流唱戏”的目标，开展“纪念福州建城 2200 年暨’98 福州国际招商月”活动，冶城学术研讨会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闽越国都城——“冶”的地望，自《史记》以来的两千多年间，历代学者都认为在今天的福州。到了本世纪三十年代，首次出现了“浙南说”，随之劳干先生对冶在“福州”的观点作了十分系统的考证。建国后，随着现代考古学在我省的开展，崇安汉城等一批汉代遗址相继在闽北的发现和考古发掘，于是又出现了“闽北说”。最近几年，福州屏山地区陆续出土了汉代遗物（如“万岁”瓦当等），“福州说”的论点在大量文献资料支持的基础上又得到了考古材料的佐证。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学术讨论，在新的考古材料日益增多的情况下，渐渐趋向同一。

我们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于去年就广泛地向全国各学术团体和科研单位及海外学者发出邀请，征集论文。受到了各地有关专家学者们的广泛响应。今年 5 月 21 - 23 日，“冶城学术研讨会”如期在福州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来自北京、浙江、广东、福建及台湾的专家学者 81 人，大会收到各类学术论文 69 篇。中共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赵学敏，中共福州市委副书记、福州市市长翁福琳等领导到会表示祝贺。经过与会同志的共同努力，研讨会取得了很大成果，大家在“冶”城问题上观点进一步趋向一致。通过讨论，绝大多数学者包括一些原来持“闽北说”的学者都接受了“二王二都”的论点：即闽越国时期同时并立的二个国王，其正统的国都“冶”在福州，它是当时闽越族的政治、经济中心；同时，崇安汉城也是闽越国时期的一座规格很高的城址，极有可能是东越王余善的王城。当然，应该承认由于新出土的考古材料尚未有完全的说服力，同时仍有少数学者依旧持“闽北说”；在“福州说”的观点，也存在对具体地望是在屏山一带，还是在新店古城的分歧。这些分歧的存在，也就对我们今后的考古工作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应当加强在福州地区，特别是冶山一带的考古发掘工作，力求找到汉代“冶城”的宫殿或其它有说服力的遗迹，以求圆满结束对“冶城”地望的争论。我们相信，只要领导上重视，同志们努力，这一天的到来是不会太遥远的。

本书所收论文，基本反映了这次学术讨论会的成果。每篇文章都有一定的学术质量。但由于时间仓促和水平所限，选编工作还存在一定缺点，欢迎大家批评指正。同时，因为篇幅所限，少量文章未能收入本书，还祈望作者们见谅。

在本书的编选过程中，得到海风出版社的大力帮助，编辑同志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建议，使本书得以与广大读者见面，在此谨表谢意。



1998 年 8 月

目 录

闽越东冶汉冶县的治所问题	黄展岳 (4)
关于闽越历史的若干问题	卢兆荫 (9)
城村古城不是闽越国城	林汀水(13)
再谈冶都、冶县、东部侯国	
与东部侯官的沿革、治年问题	林汀水(17)
关于“冶”在福州的历史论证	黄启权(21)
冶城的福州的考古新证据	范雪春(24)
汉城越国都城考	王振镛(36)
闽越国冶城考略	黄荣春(39)
闽中第一城	卢美松(48)
闽越王无诸的冶城在福州新店	欧潭生(52)
新店古城是闽越冶城的卫城	王华南 姚亚丹(54)
“冶”城在何处	杨秉纶(59)
浅议闽越国的兴亡及闽越国都城	陈锦谷(63)
“冶”城的几个问题	姚亚丹(68)
西汉朝廷与闽越国的关系和余善的反叛	林 果 高健斌(71)
论闽越国建国与都城	林祥瑞 刘祖陞(74)
冶、东冶、侯官与闽越二王二都	徐心希(77)
“冶”在福州	朱云斌(82)
“冶”与福州	曾意丹(88)
也从郡县沿革看冶城地望	郭志超 吴春明(91)
冶城不在泉山下	钟礼强 吴春明(96)
从闽越史探讨闽越的都城	蒋炳钊(101)
关于闽越国都的地望问题	杨 琮(106)
东越泉山与闽越之冶	林慰文(111)
冶都地望研究的回顾和管见	辛土成(117)
福州屏山农业厅用地试掘简报	周春水 高健斌(121)
福州屏山、冶山一带的冶城遗迹	张 勇(128)
闽越国史迹考	官桂铨 官大梁(130)
闽侯闽越王祠庙	张发平(142)
闽清永泰的闽越王史迹	林跃先(144)

越王山闽越史迹	杨晓蕾 (146)
关于昙石山文化界定的重新思考	吴绵吉 (148)
福州地区的原始居民	陈 龙 (153)
闽江下游原始居民点的形成及福州 早期城市的产生	郑国珍 (163)
福州地区的早期历史及城市发展	林忠干 (167)
试论福州城市的起源	陈子华 (174)
秦汉闽中地名考析二则	林汀水 (177)
福建政区建置的过程及其特点	林汀水 (180)
福州市区水陆变迁初探	林汀水 (186)
福州自然地理变迁	游天星 (192)
福州历代城池	曾 江 严 珍 (194)
福州建城史之思考	林伟功 (200)
浅谈福州城池的六度变迁	潘 群 (203)
王审知与福州城垣建设	肖忠生 (205)
福建晚唐五代考古与王审知治闽	梅华全 林存琪 (207)
一个传教士眼中的福州	叶 翔 (213)
粤闽地区汉代建筑遗址的比较研究	邱立诚 (217)
浙南先秦文化述略	王海明 (224)
古代福州与琉球	陈仲玉 (232)
福州与冲绳的关系	徐恭生 (238)
在冶城与福州历史学术研讨会上的主题报告	黄展岳 (249)
附录	
秦郡考	王国维 (254)
汉会稽东部都尉治考	王国维 (256)
后汉会稽东部候官考	王国维 (257)
汉晋闽中建置考	劳 干 (258)
古闽地考	叶国庆 (265)
冶山财政厅用地的考古新发现	朱云斌 周春水 (271)

闽越东冶汉冶县的冶所问题

黄展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史记》说闽越国“都东冶”，《汉书》说闽越国“都冶”。这“东冶”是否即“冶”，是一个地方还是两个地方？汉灭闽越后，其地置冶县。冶县的冶所是在原闽越都城处还是另设新址？古代和近现代的史家多数认为，东冶即冶，冶都、冶县的冶所均在今福州市。本世纪三十年代，厦大叶国庆先生首倡东冶在浙江章安^①。五十年代以来，随着崇安（今武夷山市）城村汉城的发掘，邵武、浦城、建阳等地多座汉城址的发现，闽越冶都、汉冶县的冶所问题又出现多种说法。有的学者承认东冶即冶，但认为冶所在崇安或浦城；有的则认为，“东”是衍文，正名是“冶”，闽越冶都西汉冶县均在崇安，东汉移置福州，故改称“东冶”；有的则认为，闽越冶都在崇安，汉代冶县在福州；等等^②。我赞成多数史家的传统看法。下面稍加归纳，并就新出现的不同意见，谈点自己的看法。希望通过磋商，达成共识。

一、东冶即冶

《汉书·闽粤传》几乎全部抄自《史记·东越列传》，仅“都东冶”作“都冶”。历代注家都认为“都冶”即“都东冶”，未有歧异。通检《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四书中提到东冶和冶的共十三处。见于《史记》本传、《后汉书》书中的〈郑弘传〉、〈东夷传·倭〉、《三国志》书中的〈魏书·王朗传〉、〈魏书·东夷传·倭〉以及〈吴书·孙策传〉、〈贺齐传〉、〈吕岱传〉等篇皆作“东冶”，仅《汉书·闽粤传》、《汉书·严助传》、《三国志·吴书·蒋钦传》单作“冶”。可见东冶是正名，冶是省称，东汉、孙吴时“东冶”故名犹存。近似的例子还有：史汉本传谓“汉复立闽君摇为东海王”，《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汉书·地理志》作“汉复立闽君摇为越王”，而《汉书·惠帝纪》为“立闽越君为东海王”，是知“闽越君摇”可省称“闽君摇”，“东海王”可省称“越王”。又如《汉书·百官公卿表》少府属官有中书谒者令，同书《司马迁传》省称“中书令”，《贾捐之传》省称“中谒者”。地名、职官名在史汉书中常见全称、省称杂用。出土汉铜器铭刻、封泥，使用省称者更多。东冶即冶殆无疑义。

劳干认为“东”是方位词。他说，“冶在中国之东，故亦称东冶，亦犹蜀称西蜀，羌亦称西羌”^③，亦可备一说。

二、东冶、冶县是一地，同在福建境内

汉初闽越王无诸和东瓯王（或作东海王、东越王）繇分立，分别领有今福建（闽越）和浙江南部（东瓯）地。闽越国都东冶自应在福建境内。建元三年，东瓯“举国徙中国”，故地并入闽越国。此后，史籍有时称控有东瓯故地的闽越国为东越国，但未见冶都迁东瓯故地的记载，也未见东瓯亡后另置郡县的记载，说明冶都仍在旧地。建元六年，闽越国内出现越繇王丑和东越王余善二王并立，“越繇王奉闽越先祭祀”，说明正统的越繇王丑仍都东冶，非正统的东越王余善居闽西北。

元封元年，汉灭闽越，置冶县。县名冶，显然是沿用冶都之名，县治自应在原东冶处，辖地亦应涵盖

闽越、东瓯二故地。《汉书·闽粤传》补注：“何焯曰，案朱育传汉灭东粤以为冶，冶之为县在国灭之后。……史因后日之名书之。”亦可证冶都、冶县的冶所应在同一地点。

《汉书·地理志》会稽郡下开始出现“冶、回浦”二县并列，说明自西汉后期，“闽越为冶，东瓯为回浦”的辖域已经形成。以后在这片地面上设置的郡县、部都尉、州府，均由冶、回浦分别演化出来，不相统属。对此，王国维考证甚详④，此处不赘。

或以为《续汉书·郡国志四》有“章安故冶，闽越地，光武更名”，因断冶在章安。关于这点，宋人早已辨正，中华书局校点本（3500页），校勘记：“《通鉴》胡注引洪氏《隶释》，谓中有脱文，当作‘章安故回浦，章帝更名。东侯官故冶，闽越地，光武更名’，于文乃足。”可为定论。

三、东冶、冶县治所均在福州

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下面三方面考察。

（一）从汉灭闽越的进军路线考察，据史、汉本传，汉灭南越后，汉武帝即令楼船将军杨仆率“诸校屯豫章梅岭（今江西宁都北）待命”进击闽越。翌年（元鼎六年）余善反，“入白沙（今南昌北鄱阳湖西岸）、武林（今鄱阳湖东岸）、梅岭，杀三校尉”。于是，“天子遣横海将军韩说出句章（今浙江慈溪南），浮海从东方往；楼船将军杨仆出武林；中尉王温舒出梅岭；越侯为戈船、下濑将军，出若邪（浙江绍兴县东南）、白沙（浙江乐清县东）⑤。元封元年冬，咸入东越。”另有故越衍侯吴阳，“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军于汉阳（今浦城北）。”及故越建成侯敖与繇王居股谋，俱杀余善，以其众降横海军。”从这段记载，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看法：汉灭闽越，采用海陆并进的战略。杨仆、王温舒攻闽西北，对手是东越王余善；韩说与二越侯由海道南下，直取繇王居股（丑之子）住地，即东冶。余善先胜后败，最后遁走。元封元年冬，各路汉军集结东冶城下。建成侯敖与居股合谋诛杀余善，降横海将军。是知余善遁走东冶被杀。东冶其地必在入海口处。

另据《汉书·朱买臣传》：

“是时，东越数反覆，买臣因言：‘故东越王居保泉山，一人守险，千人不得上。今闻东越王更徙处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泽中。今发兵浮海，直指泉山，陈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灭也。’上拜买臣会稽太守。……买臣到郡，治楼船，备粮食、水战具，……居岁余，买臣受诏将兵，与横海将军韩说等俱击破东越。”

这段传文再次证实，以韩说为主帅的汉海军，是最后击破闽越的主力，闽越都东冶，自应在入海口处。但传文三见“泉山”地名，所指显然不是一地。如系泉山于浦城县北，则后一“泉山”有误；如系泉山于福州冶山，则前二“泉山”有误。案朱买臣言论在元鼎五、六年间，是时汉越双方兵力对峙在武夷山，胜负未决，余善并未“徙处南行”。从上引本传，知余善“徙处南行”、“居大泽中”应在元封元年。其所以出现违异难通，盖因古代交通不便，仅凭传闻，不免失实；或后人传写致误亦未可知。我们大可不必为“泉山”一词而纠葛。类似的情况，还可以举载于《汉书·严助传》中的淮南王安奏书为例。奏书云：“臣闻道路言，闽越王弟甲弑而杀之，甲以诛死，其民未有所属。”颜注：“甲者，闽王弟之名。”如果相信颜注，无诸之后应有王甲。按史汉本传，闽越世系可确定的仅四世，即无诸、郢、丑、居股，另有建元六年以后与丑、居股并立的郢弟余善，而无所谓“甲”。王先谦补注引顾炎武云：此即“闽越王（郢）弟余善杀王以降者也，当淮南王上书时，不知其名，故谓之甲，犹某甲耳。”顾炎武的意见是正确的。

（二）从福州的历史地理考察 福州是历代福建首府，历史沿革清楚。在福建境内，福州及其附近发现的先秦遗迹、遗物最多，所反映的文化发展水平最高，是孕育闽越国统治中心的最理想地方。《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说，楚威王灭越王无强后，“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后七世，至闽君摇，佐诸侯平秦。汉高帝复以摇为越王，以奉越后。东越，闽君，皆其后也。”估计在楚灭越后，已有一部分越人定居于今瓯江和闽江下游一带，所以才会出现汉初无诸都东冶、闽君摇

都东瓯的局面。

再从地理位置看，福州位于闽江下游，海潮可达，历来是福建省的政治、文化、经济、交通中心，又是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以秦汉时期来说，当时沿海地区的王国都城和郡县治所，大多位于大江大河入海口处，而且大多是都城、郡县治所连续沿用。例如：秦会稽郡治沿用越国都故地，位于长江下游古文化中心的太湖东岸，至东汉时，原地为吴郡郡治，会稽郡治迁浙江山阴，位今杭州湾南岸。又如南越国都番禺，位于珠江三角洲，秦为南海郡治，汉灭南越后仍为南海郡治，重新调整和新设置的郁林、苍梧、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玕、儋耳八郡郡治，都在近海口或大河边，无一在山区者。国情与南越国基本相似的闽越国，都城设在福州，自是顺理成章的事。至于秦设闽中郡，因秦祚短暂，未及设官置吏而秦已亡，闽中郡遂形同虚设。如果秦时考虑设置闽中郡治所在地问题，我认为无诸都东冶将是首选地址。

(三)从考古资料考察 秦汉时期的福建考古资料，除闽西北以外，也是以福州及其附近的发现为最多。福州西郊庄边山有战国至汉初的楚人墓群^⑥，荆溪庙后山有闽越墓^⑦，北郊新店村有闽越城址^⑧，市区内浮仓山、屏山有多处闽越建筑遗迹和大批闽越遗物^⑨。新店古城址处，地势较高，城址平面似为长方形，东城墙残长 287 米，北城墙长约 310 米，西城墙残长 478 米，南城墙已毁。西城墙外发现有卵石铺砌的道路和护城河。城址内有绳纹砖瓦，有方格纹陶片。还发现战国墓一座。浮仓山、屏山先后发现汉初建筑瓦堆积层，堆积层中留有木炭灰烬痕迹。出土砖瓦不下数万片，其中有“万岁”、“万岁未央”文字瓦当，菱形纹铺地砖，戳印于板瓦内侧的蛇形文字（似为“闽”字初文）。发掘者推定新店古城始建于战国末至汉初，似为无诸始都的东冶宫城；市区内的建筑遗址，似为汉初复立无诸为闽越王及其后世扩建的东冶城。新店古城因工作较少，发掘面积不大，目前还存在不同看法，建议继续工作，以后再作讨论。市区内发现的遗物，与笔者在与西安汉长安城内多年考古发现的同类遗物相类似，与广州南越官署遗址所见尤为接近，年代确属西汉^⑩。这批建筑遗址和遗物的发现，为闽越国冶都、汉冶县在福州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值得注意的是，闽越国与南越国的兴衰大体相同，福州与广州的历史沿革也大体相同。广州考古工作证实，从秦末任嚣营建南海郡治番禺城，南越赵佗始都，直到现在的广东省政府，历代首府治所均在今广州市区内。福建自西晋太康三年置晋安郡以来，首府治所均设在今福州市区内，闽越建筑遗址和汉代遗物的发现，则可能证实，西晋置郡以前的闽越东冶城、汉冶县县治、东部侯官治所也是在今福州市区内。

四、关于闽西北的闽越城址问题

闽西北山峦重叠，地形险恶，交通不便。适于用兵，不利于治民。闽越王无诸死后，继承王位的郢和余善都想扩张自己的割据地盘，“数举兵侵袭百越，并兼邻国”（《汉书·严助传》），招致汉朝的干预，郢和余善都把汉朝驻扎在豫章郡的官兵视为扩张的主要障碍，在武夷山东侧部署大量驻军，大力营建城堡和军事设施。据明何乔远《闽书》引《建安纪》云：“越王筑六城以拒汉。”这六城是：邵武县东的乌坂城；建阳西南大潭山的大潭城；浦城县北的汉阳城；浦城县南的越王城和今浦城县故址的临浦城，以及崇安县（今武夷山市）城村古粤城^⑪。这六座城址均经考古调查认定，同时还发现一些不见于史籍记载的汉代城堡遗址^⑫。除城村古粤城进行过较多的勘查发掘以外，其它仅作地面调查。据笔者了解，这些汉城址范围都不大，大约都是军事性质的城堡或聚落。大批城堡的出现，说明在闽越国后期，闽西北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在军事任务的带动下，当时闽西北的开发，人口的增殖，经济的发展，在客观上起了积极作用。但它们距离都城的基本要求都存在较多差距，不会是王都所在。

那么，城村古粤城有没有可能是闽越国的冶都呢？对这个问题，我在过去的一篇小文中曾附带讨论过^⑬。我认为，城村汉城可能是余善所都，但不是正统的闽越国都东冶（或冶都）。下面把旧文的看法稍作补充叙述。

城村汉城可能是余善所都的主要依据可以在《史记·东越列传》（《汉书》本传略同）中找到答案，传

文云：

“建元六年，闽越击南越。……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农韩安国出会稽，皆为将军。兵未逾岭，闽越王郢发兵距险。其弟余善乃与相、宗族谋。……即纵杀王，使使奉其头致大行。大行……乃以便宜案兵告大农军，而使使奉王头驰报天子。诏罢两将兵，曰：‘郢等首恶，独无诸孙繇君丑不与谋焉。’乃使郎中将立丑为越繇王，奉闽越先祭祀。余善已杀郢，威行于国，国民多属，窃自立为王。繇王不能矫其众持正。天子闻之，为余善不足复兴师，曰：‘余善数与郢谋乱，而后首诛郢，师得不劳。’因立余善为东越王，与繇王并处。”

由上面引文推定：王恢、韩安国出兵，闽越王郢“距险”，其地必在武夷山沿线；王恢出豫章，余善杀郢，奉其头致王恢，知杀郢当在武夷山附近。郢被杀后，武帝封“丑为越繇王”，随后又封余善为东越王，与“繇王共处”。在哪里共处？上引传文虽然没有交待，但可以从上下文义推定：武帝封“丑为越繇王，奉闽越先祭祀”，知丑之王都必是无诸所都的东冶。余善封东越王，不可能到东冶与丑“共处”，而最大的可能性应在余善“距险”、“杀郢”处，即今武夷山附近。现在发现的崇安汉城，地处崇溪西岸，距离武夷山仅十余公里。城址建筑在起伏的丘陵地上，西高东低，逶迤而下。城垣城门气势雄伟，宫殿官署布置井然，城外又有礼制建筑，已基本上具备汉代王国都城的条件^①。无诸死后，嗣王郢“数举兵侵袭百越”，与汉朝为敌，凭借武夷山的险峻地形，集结重兵，营建城堡，其中的城村汉城，在余善杀郢以前可能已初具规模。杀郢后，余善“威行于国”，“自立为王”，逼汉武帝承认既成事实，封他“东越王”。他选定城村汉城为王都，扩建城池，增饰宫室，是很可能的。考古发现的城村汉城遗址，主要年代属闽越国后期，推测大部分建筑应是在余善称王至败亡的二十多年间（前135—前110年）营建的。在闽西北还没有发现比城村汉城更具规模的闽越国城址以前，我以为把它看成余善所都当不会大错。

至于余善是否把城村汉城叫“冶”？我看也有可能。这是因为在中国古代，确有新地沿用旧地名的传统。例如成汤至盘庚，商王朝曾五迁其都，所迁之地皆曰亳。楚都江陵、陈城、寿春，其都城皆曰郢。东晋南渡后的侨置州郡县，均沿用北方原地名，等等。更重要的是，余善“狼戾不仁”，狂妄自大，自视为闽越国的正统，根本不把都东冶的繇王丑放在眼里，况且汉武帝又封他为“东越王，与繇王共处”，为了表示与东边的“冶”相对立，余善很可能把所都仍以“冶”名。以后，余善发展到“刻‘武帝’玺自立”，效南越国赵佗称帝故事。在当时，城村汉城的“冶”的声名可能已在“东冶”之上。古籍中出现“东冶”与“冶”二名，历代史家为此发生长期争论，看来与余善所都仍名“冶”及其在历史上的影响可能有关系。

以上这些意见，尚缺乏实证，寄望在今后的考古工作中经受检验。

注释：

①叶国庆：《古闽地考》，《燕京学报》15期，1934年。又《冶不在今福州市辨》，《禹贡》6卷2期，1936年。

②陈国强等：《百越民族史》第六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福建省博物馆编：《闽越考古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书中有多篇文章认为闽越冶都、汉冶县在今闽西北。

③劳干：《汉晋间闽中郡郡建置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1935年。

④王国维：《汉会稽东部都尉治所考》，《后汉书会稽郡东部侯官考》均见《观堂集林》第二册，中华书局，1959年。

⑤明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九二“绍兴府会稽县”条谓若邪山在“府东南四十五里，汉元鼎六年遣戈船将军计闽越，出若邪，盖由此泛海而南也。”近人朱维干云：“若邪，即若邪山，在今绍兴县东南四十五里。白沙，地名，有二：一在江西鄱阳县西水路百二十里；二在今浙江乐清县东五里有白沙寨，为水陆要害。越将戈船、下濑将军同出若邪、白沙，盖由绍兴而乐清，以攻闽越之东北也。”见《福建史稿》上册38页注2，福建教育出版社，1984年

⑥《闽侯庄边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61年1期。《闽侯庄边山遗址1982~1983年考古发掘简报》，《福建文博》1984年2期。

⑦黄汉杰：《福建荆溪庙后山古墓清理》，《考古》1959年6期。

⑧《南方古城考古有重大发现》，《中国文物报》1997年6月15日。

⑨《福州闽越故城发现一批瓦当文字》，《中国文物报》1997年12月21日。

⑩《广州发现南越国御花园遗迹》，《中国文物报》1998年1月25日。《广州发现南越国官署遗址》，《中国文物报》1996年2月11日。笔者曾有幸参观考察。

⑪朱维干：《福建史稿》上册，38，39页，福建教育出版社，1986年。

⑫参看1984年建阳地区编《闽北纪略》和福建省博物馆文物普查资料。

⑬拙作《闽越、南越和夷洲的比较研究》，《福建文博》1990年增刊。

⑭《福建崇安汉城遗址试掘》，《考古》1960年10期。《崇安城村汉城探掘简报》，《文物》1985年11期。《崇安汉城北岗一号建筑遗址》，《考古学报》1990年3期。《崇安汉城北岗2号建筑遗址》，《文物》1992年8月。

关于闽越历史的若干问题

卢兆荫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闽越是我国古代越人的一支，主要分布在浙江南部和福建的大部分地区。《汉书·严助传》载：“会稽东接于海，南近诸越。”师古曰：“越种非一，故曰诸。”位于会稽之南的闽越族，也有一些分支。在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前，主要有闽越王无诸和闽君摇两个分支，相传他们都是越王勾践的后裔^①。《史记·东越列传》载：“孝惠三年，举高帝时越功，曰闽君摇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俗号为东瓯王。”

关于东瓯的地望，裴驷《史记集解》引徐广曰：“今之永宁也。”司马贞《史记索隐》引韦昭曰：“今永宁。”《续汉书·郡国志》记载，永宁属会稽郡，永和三年以章安县东瓯乡为县。《宋书·州郡志》载，永宁为永嘉属县。永嘉县在明清时为浙江温州府治。可见东海王（或东瓯王）为居住在今浙江南部一带的闽越族的首领，因都东瓯，故亦称瓯越。关于瓯越的历史，本文不拟详考。本文讨论的范围，拟限于居住在福建境内的闽越族。

一、闽越与东越

福建古称“闽”或“七闽”。《周礼·秋官司寇》载：“闽隶百有二十人。”又载：“闽隶掌役畜养鸟，而阜蕃教扰之。”可见闽隶是掌管“役畜养鸟”的小官。同书《夏官司马·职方氏》载：“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所谓“七闽”，大概是指闽人分为七族。《周礼》成书于战国时期，当时闽越族可能尚未建立统一的政权。

战国中期，楚大败越国后，“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②。所云“江南海上”，应指今钱塘江以南的浙江南部和福建北部地区。闽君摇和闽越王无诸都是散居“江南海上”的越国贵族的后裔。大约在战国晚期，无诸统一了“七闽”的越人，号为越（《汉书》作“粤”）王，世奉越祀^③。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无诸被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④。秦朝末年，农民起义，豪杰蜂起，无诸率闽中兵归鄱阳令吴芮，参与推翻秦朝战争^⑤。在秦汉之际刘邦与项羽的斗争中，无诸又率越人助刘邦。汉五年，刘邦即位后，立即封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⑥。

闽越国在西汉初年曾附属于南越国^⑦，到文景时期，力量也还很弱小。汉文帝时，闽越虽号称王国，但只有千人或数千人之众，国力远不如南越国^⑧。汉景帝三年，吴王濞反，曾派使者往闽越、东瓯，要求派兵参加叛乱，而闽越不敢发兵^⑨。直到汉武帝时，闽越的国力才开始强大。武帝建元三年，闽越曾发兵围东瓯，东瓯举国迁徙到江淮之间，其地便为闽越所并。建元六年，闽越又出兵进攻南越。《汉书·严助传》记载，当时闽越国“又数举兵侵陵百越，并兼邻国以为暴强，阴谋奇策，入燔寻阳楼船，欲招会稽之地，以践勾践之迹。今者边又言闽王率两国击南越。”可见这时闽越国的势力已相当强大，西面“入燔寻阳楼船”，拓展到江西西北部；北面“欲招会稽之地”，进逼浙江南部地区。所谓“率两国击南越”者，王先谦《补注》认为指闽越并东瓯后，率闽越、东瓯两国的兵力攻南越，但误称“东瓯”为“东粤”。

南越被闽越攻击，求救于西汉朝廷。朝廷派兵从豫章、会稽两路进攻闽越。闽越王郢企图据险抵抗，而郢弟余善惧怕汉兵强大，遂与闽越“相、宗族”合谋杀郢降汉，西汉朝廷另立无诸孙繇君为越繇王，“奉闽越先祭祀”，意即由越繇王承担祭祀闽越祖先事宜。

余善杀闽越王郢后，势力逐渐强大，“威行于国，国民多属，窃自立为王。”繇王无力控制他，汉武帝又不想再派兵征讨，于是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另立余善为东越王，“与繇王并处”。从此在原闽越国内存在两个统治集团，一为奉闽越祭祀的繇王，一为新立的东越王。繇王应仍都东冶，东越王当另有王城，两王并处于闽中故地。

汉武帝元鼎六年秋，在“汉兵临境”的形势下，东越王余善终于造反，“发兵距汉道，号将军驍力等为“吞汉将军”，入白沙、武林、梅岭，杀汉三校尉。”并刻印文为“武帝”的玉玺，自立为皇帝。于是汉兵分为三路，于元封元年攻入东越。在汉兵的强大压力下，繇王居股与原东越将领衍侯吴阳、建成侯敖等合谋杀死余善，投降汉朝，东越灭亡（以上均见《史记·东越列传》）。从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立余善为东越王，至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余善被杀，东越前后只存在二十余年。

繇王居股是越繇王丑之子^⑩，越繇王是闽越族中比较亲汉廷的政治势力。在闽越王郢攻南越与汉朝廷对抗时只有繇君丑没有参与，因而被汉武帝封为越繇王。在平定东越王余善的过程中，繇王居股虽然立了功，但却被改封为东成侯，实际上是降了一级。东成侯的封地在江西九江^⑪，居股因而也离开闽中故地，原来闽越族占据的地盘从此全归汉朝统治。

在史书记载中，对东瓯、闽越、东越、南越常有相互混淆的现象。例如：《史记·吴王列传》载：“七国之发也，……发二十余万人。南使闽越、东越，东越亦发兵从。”所载“东越”显系“东瓯”之误。同书《西南夷列传》载：“建元六年，大行王恢击东越，东越杀王郢以报。”所云“东越”则是“闽越”之误。同书《韩长孺列传》载：“建元中，……闽越、东越相攻，安国及大行王恢将。未至越，越杀其王降，汉兵亦罢。”此处的“东越”则是“南越”之误。《汉书》所载亦多承袭其误。出现这种错误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东瓯、闽越、东越及南越都属越族，因而易于混淆的缘故。这给研究闽历史无疑增加了许多困难。

二、闽越都城东冶与汉冶县的地望

关于闽越王无诸的都城，《史记·东越列传》载：“都东冶”；《汉书·闽粤王传》则作“都冶”。《宋书·州郡志》载：“建安太守，本闽越，秦立为闽中郡。汉武帝世，闽越反，灭之，徙其民于江、淮间，虚其地。后有遁逃山谷者颇出，立为冶县，属会稽。”可见冶县，是汉武帝灭闽越、东越，并改封繇王居股为东成侯之后，在原闽越王都城东冶故地建立的。所以闽越的都城应从《史记》称“东冶”，《汉书》作“冶”，是班固“因后日之名书之”^⑫，即用后来建立的“冶县”称原来的“东冶”。

汉代的冶县是在闽越都城东冶的基础上建立的。东冶究竟在何处，《史记》、《汉书》无明文记载，因而史学界意见纷纭。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根据文献记载并结合考古资料进行探讨。

关于东冶的地望，历代注家多有论述。《史记·东越列传》、《集解》、《索隐》引徐广曰：“今（本）建安侯官是”。案：侯官为闽州。《正义》：“今闽州又改为福也”。《汉书·地理志》记载，会稽郡有冶县。师古曰：“本闽越地”。《续汉书·郡国志》无冶县，有东部侯国。注家认为“东部侯国”应系“东侯官”或“东侯官”之误。《旧唐书·地理志》记载，福州中都督府闽县为“汉冶县，属会稽郡，秦时为闽中郡，汉高立闽越王都于此。武帝诛东越，徙其人于江淮，空其地，其逃亡者自立为冶县，后更名为东冶县，后汉改为侯官都尉，属会稽郡。……开元十三年改为福州，皆治闽县”。这是对汉冶县的沿革较全面的叙述，基本上是可信的。汉代的冶县是在闽越都城东冶的基础上建立的，已如上述，其地望在今福州附近的记载，应该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早在三十年代，劳干先生就曾著文，认为“西汉之冶，东汉之侯官除今福州市附近以外，更无适宜之地矣。”^⑬其论断是正确的。

以上是根据文献记载对东冶（冶县）地望进行的论证，为了判断论证是否无误，尚须结合考古资料作

进一步的探讨。福建省文化厅文物处与福建省博物馆组成的考古队在福州市北郊新店古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的结果证明，该古城的城墙可分为三期，“一期城墙始建于战国晚期至汉初；二期城墙补筑于汉初，宽达23米；三期城墙补筑于唐宋时期。”在古城内发现汉初建筑基址，在古城东南的浮仓山和南面的屏山也曾发现汉初的建筑遗址。发掘者认为这两处遗址可能是闽越王无诸兴建的王城附属建筑的遗迹^⑭。此外，在屏山汉初建筑遗址中还出土龙凤纹“万岁”瓦当、“万岁未央”瓦当、云纹瓦当以及带“闽”字初文戳印的瓦片等^⑮。

上述考古发掘成果说明，新店古城始建年代正是无诸立为闽越王之时。二期城墙有可能是汉高祖五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东冶作为闽越国都城时补筑的。三期城墙的存在说明，汉武帝改东冶为冶县后，冶县古城可能一直被沿用至唐宋时期，位于屏山的汉初建筑遗址出土与汉长安城遗址相类似的文字瓦当、云纹瓦当等，发掘者推测为闽越王宫所在地。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新店古城的形制和布局，取得更丰富的考古资料，以便进一步证实古城确系闽越都城东冶和汉冶县的旧址。

此外，在闽侯庄边山先后发现9座战国晚期至西汉初年的墓葬^⑯。这些墓葬的形制、随葬品中陶器的组合及器形特征等，具有浓厚的楚文化遗风，同时墓中也出土越式陶器^⑰。有的同志进一步认为这几座墓为战国楚墓，是当时楚人势力到达福建的确切证据^⑱。战国后期楚威王杀越王无强后，南迁于江南海上的越国人皆“服朝于楚”，已如上述。闽越王无诸为越人的后裔，与楚人有较密切的关系。闽侯庄边山战国楚墓的发现，也可作为东冶在福州地区的佐证。

三、崇安汉城可能是东越王余善的王城

崇安汉城从五十年代末发现以后，经过三十多年来的勘探、发掘，取得了丰富的资料，基本上查明城址范围、形制和城内外遗迹遗物的分布状况^⑲。关于崇安汉城遗址的年代和性质，虽有不少学者曾著文探讨，但仍存在不同的意见，恕不一一介绍。

关于崇安汉城的年代，发掘者前后有不同的意见。六十年代初发表的简报认为，城址可能早到西汉，废弃于东汉末期^⑳。八十年代随着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在发表的简报中提出，城址的始建年代应为“西汉前期，即闽越国时期，可能还早到秦晚期。”“下限可能延长到西汉末或东汉初年。”^㉑ 1985年至1986年发掘了北岗一号建筑遗址，在九十年代初发表的发掘报告中，“通过对遗址中出土的器物和建筑材料的分析类比，判断遗址的时代为西汉前期^㉒。”可见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进行，发掘者对城址的年代也逐步提出了更明确的意见。

关于城址的年代和性质，杨琮同志发表的文章认为，“城址的时代应是西汉前期及西汉中期的前段。其绝对年代的上限不超过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下限则止于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城址的性质应是闽越国都中的王城（宫城）”。^㉓杨文关于城址年代的论断基本可信，至于城址的性质为王城的看法也是正确的，但究竟是闽越王的王城还是东越王的王城似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崇安汉城南北长约860米、东西宽约550米，城墙周长2896米，总面积共48万平方米。杨琮同志认为“若作为闽越国都城看，规模显然太小。作为王城（宫城）则比较合适”^㉔。这个意见是正确的。城址内有集中的大型宫殿建筑群，并出土“常乐”、“万岁”、“乐未央”、“常乐万岁”等文字瓦当，因而废弃之前应是王城无疑。

根据文献记载，无诸在秦统一全国之前，即自立为闽越王，从考古资料考察，崇安汉城年代的上限不超过西汉初年，因而不大可能是闽越王无诸的都城东冶。闽越国在汉文帝、景帝时期，国力还很弱小，无力向外派兵。到汉武帝时期，闽越国的势力逐渐强大，并向外扩张，曾先后派兵围东瓯、击南越，闽越国此时可能已在闽西北的崇安、浦城等地设立军事据点。建元六年，汉武帝派王恢、韩安国两将军帅兵分别从江西、浙江进攻闽越，“兵未逾岭，闽越王郢发兵距险”（《史记·东越列传》）。所谓“岭”，应指武夷山脉，郢凭借武夷山脉为屏障以守险。崇安汉城修建于群山之中，城墙大多沿小山脊修筑，有利于防守；城